

爱国实业家刘靖基：创办全国首家民营企业

□ 王昌范

今年是中国老一辈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著名爱国人士和社会活动家、民建先贤刘靖基诞辰120周年。这位爱国实业家曾经创办常州大成纱厂、上海安达纱厂，改革开放之后，党和政府落实原工商业者政策，发还资金，他号召海内外工商业者集资5700多万元，创办全国第一家民营企业——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并以80岁高龄出任上海市国际投资信托公司董事长。

刘靖基(1902年—1997年)，又名刘伯寅，出生于江苏常州，原籍江苏靖江。6岁就读私塾，1911年，转入县城西郊初等小学。那年正值辛亥革命，少年刘靖基参加学校的“童团”，拿了小旗帜上街游行，庆祝辛亥革命的胜利。12岁时刘靖基考上了武进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接受新式教育和新的思想。1916年，考取江苏省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该校的前身是清政府官立中等工业学堂和江苏省铁路学堂，1912年5月合并成为江苏省立第二工业学校，设土木、染色、机械三科，学制四年。学校设在苏州，刘靖基学习刻苦，刚读完一年就病倒了，不得不回家休养。不幸的是，这一年他父亲病逝，刘靖基只能辍学就业。

1918年秋，刘靖基经人介绍到上海，入宝兴长总号当练习生，拜著名实业家刘柏森为师。宝兴长号是刘柏森创设以经营燃料、纱、布为主要业务的商号。刘靖基勤勉好学，加上天资聪颖，很快掌握了经营的技能，深得刘柏森赏识，半年后转为正式职员。1919年，宝兴长号，刘靖基被先后派往刘柏森所办的纺织企业——苏纶纱厂、宝丰纱厂、宝成纱厂任职。当时，因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纱价大跌，国内纱厂损失惨重。为了挽回纱厂造成的损失，1923年，刘柏森派遣刘靖基驻汉口的宝成纱厂收花处，任命其为该处的副主任。一年下来，收花处为企业获得不少利润，刘靖基也因此得到奖励。

创办大成纱厂

在创办大成纱厂之前，1924年，刘靖基尝试着自己投资企业，开设上海裕靖工厂，自任经理，因市场不景气，经营不下。1925年，他又回到苏纶纱厂，此时的苏纶纱厂已为严裕棠所接管，刘靖基任该厂营业主任，主要负责市场营销，直至1930年。

1930年2月，刘国钧(刘靖基族侄，但年龄长于刘靖基15岁)获悉常州大成纱厂因故停产，有意收购，但资金存在缺口，诚聘刘靖基共同收购接管。由于刘靖基在沪经营与银行界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于是，他俩集合50万元资本，接管这个有上千名职工的大型纱厂，改称为常州大成纺织染公司，刘国钧任经理，刘靖基任协理。刘靖基主要在上海负责营业所，那时他才28岁，但已经跻身实业界。黄炎培在日记中记录了与刘国钧、

刘靖基的交往：“1931年8月31日，星期一，偕朴奇招李升伯、刘国钧、刘靖基功德林午餐。”这说明黄炎培与刘靖基很早就认识。在经营大成纱厂期间，刘靖基也赴日本考察过纺织业。

刘国钧、刘靖基经营常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厂房作抵押，向上海银行贷款40万元作流动资金，将其中的12万元用于检修和更新设备。开工后，生产、销售比较顺利，到该年底盘结，盈利达50多万元。1932年，大成纱厂添置丝光车、烘燥车、轧光机等印染设备，逐步向专业化印染厂过渡。1934年，又添置生产灯芯绒的机械设备，经过试车成功生产出国产灯芯绒。大成纱厂成为民族棉纺织工业中最早生产此类产品的厂家。到了1936年，大成公司已发展为4个厂，其中常州3个厂，汉口1个厂，资本增加到400万元，纱锭由1万枚增加到5万枚，日产纱布达5000余匹。经济学家马寅初颇有感慨地说：“像大成这样8年增长8倍的速度，在民族工业中实是一个罕见的奇迹。”

成功的民族工商业企业，一般都注重企业经营，大成纱厂的特征是营造和谐的劳资关系，劳资关系处理得好有利于生产，有利于产品质量。大成纱厂的职工大多数是常州本地人，为了解决职工后顾之忧，大成纱厂办食堂、建宿舍，开办子弟学校、保健站、卖品部、休养所，还按照当地习俗建造功德堂，有贡献的员工去世立碑人墓，老年员工去世开追悼会，并购地置办大成公墓；还办集体婚礼，改革婚嫁陋习；对于员工子弟中的优秀生，还由公司直接吸收当练习生。1934年，某报记者曾对大成公司进行采访后写道：“大成公司工厂对于工人，工作上严格要求，加紧训练，生活上注意工人之道德修养，尽量体恤工人之生活，不惜巨资，力谋工人之福利，业已举办者，有单身女工宿舍、单身男工宿舍、工人家庭宿舍、工人补习班、工人子弟学校、工作训练班、工人膳堂、娱乐室、运动场、男女浴室、公共礼堂、医院，甚至公墓，亦已办成。还筹办了托婴所、幼稚园等。”大成纱厂从未发生过工潮，这是大成纱厂和谐劳资关系的重要标志。

1937年11月，日军人侵常州，大成一、二、三厂遭到日机轰炸，尤其是二厂被炸成废墟，损失惨重。在帝国主义、封建本家和官僚资本三重压迫下，民族工商业发展难上加难，刘靖基在夹缝中求生存，重心移向上海，利用租界的特殊条件，创办安达纱厂。

创办安达纱厂

刘靖基和刘国钧原本设想大成纱厂在内地再建造一个纺织厂，然而因为战事，向洋行定购的瑞士利妥纱锭无法运至内地。时间紧迫，于是聘请英籍的印度人安诺出面申请，在香港注册，

获批在上海租界开设纱厂。这个厂就是安达纱厂，“安达”即为安全地把这批纺织设备运到了上海。刘靖基的岳父吴镜渊给安达纱厂支持了一部分资金，吴镜渊曾任中华书局董事长，在大成纱厂也当过一任董事长，他的支援，给刘靖基增加创办企业的底气。创办初期的安达纱厂，刘国钧为总经理，刘靖基为经理，厂址选在上海铜仁路中华书局印刷厂原来的厂房，员工主要是原来大成纱厂的员工、设备、技术人员也都一应俱全，没几年就运作得非常顺利，开始盈利。

抗战胜利后，安达纺织公司股本作调整，刘靖基成为大股东，任总经理，刘国钧任经理。1946年，刘靖基任全国第六区棉纺同业公会常务理事期间，为民营纱厂税收和棉花联合采购等问题大胆向当局提出建议，受到同业的拥戴，成为棉纺织行业的代表人物。1947年，刘靖基投资南京江南水泥厂，任常务董事。同年，当选为上海市商会理事、常务理事。也就是在这一年，全国纺织业联合会换届，刘靖基凭借在棉纺织业的实绩和威望，当选为该会常务理事，同时又出任苏浙皖六区棉纺同业公会副主任委员。

尽管当时刘靖基担任了许多社会职务，但是他的根基在企业。临近上海解放时，他所投资的企业已达万人。说起企业的创业史，奋斗史，刘靖基曾经感慨万千：“那时候，我是在夹缝中求生存，虽然专心经营业务，有时也发展，但很不稳定。”他举例，日军占领时期，因拒绝与侵略者合作，损失了常州企业共600万元。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实行棉花统购统销，硬是要压垮民族工业。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实业救国的梦是不可能实现的。

1948年，刘靖基去香港考察是否有设厂的可能，与黄炎培再次相遇。当了解到中共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后，刘靖基心里安定下来，于是搭乘泛美航空公司的班机飞返上海。刘靖基一回到上海，即被国民党驻沪警备司令部所注意。某日，刘靖基忽然收到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的通知，要他全家限期迁离大陆并送来机票。此时，刘靖基留在大陆的决心已定。为了预防不测，他按通知要求，只身到机场佯装离沪，待飞机起飞，便悄然折回躲进医院，迎接上海解放。这一选择成为刘靖基走向新的人生道路的重要一步。刘靖基在90寿辰时曾意味深长地说：“我年轻时理想实业救国，但是旧社会这条路走不通，我从香港飞回上海迎接解放，是我平生最大的选择。”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2日，上海市军管会、市政府在外滩中国银行四楼召集金融工商产业界的茶会，刘靖基被邀请参加。在会上，上海市市长陈毅讲到中共“恢复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表示“希望各方要有信心，不要观望，要大胆去开工生产，共产党保护民族工商业，决不使你们失望，我们讲

话绝对有把握的。”刘靖基心中的石头放下了，他很激动，在会上即席发言，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留在国内发展事业。

1950年2月6日，上海遭到美军飞机的轰炸，各行各业许多工厂被迫停产，刘靖基默默地从国外调回20万美元来恢复生产。为了帮助工商界正确对待工人群众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劳动局长会议，刘靖基因为在处理企业和谐关系上颇有体会，以顾问的名义参加会议。会议期间，刘靖基积极建言献策，协商解决劳资纠纷的对策，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回到上海后，刘靖基汇报传达会议情况，宣传中央的经济和劳动政策，为上海私营企业劳资关系起到稳定作用。不久，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上海市政协前身)成立劳资关系委员会，刘靖基被推举为主任。同年6月，刘靖基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在会议前夕，毛泽东邀请刘靖基等人前往中南海寓所聚餐，并在门前热情接待他们。席间，当毛泽东了解到刘靖基是搞纺织工业的，亲切地对他讲：“你们跟共产党合作，是有希望的，有前途的。”毛泽东鼓励他们要为人民做好事，要一贯地做下去。刘靖基深受教育，毅然决定：把当时存放在香港的设备、物资和外汇，陆续调回；把在瑞士订购的新机器设备全部运沪安装，前后共计66万美元；在浦东北蔡建造安达纱厂新厂，该厂后改为上海国棉二十八厂。

1951年11月16日，刘靖基应施复亮和盛丕华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1952年底，刘靖基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在维也纳召开的和平大会。

创办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5位工商界元老，就如何发挥原工商业者在四化建设中的作用和落实政策问题听取意见，并说：“落实政策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外汇，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你们可以有选择地搞。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不久，华夏大地出现了3家有原工商业者创办的企业。1979年9月22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集资创办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由刘靖基领衔。同年10月4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由荣毅仁领衔。1983年5月，在香港，成立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当时注册名为紫光实业有限公司)，由王光英领衔。爱建公司是其中最早成立的公司。

1979年6月，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期间，以刘靖基为代表的9届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向



刘靖基

大会提交“筹建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的建议”，得到中共中央、全国政协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爱建公司筹备时间只有短短4个月，按照预定计划，集资目标人民币5000万元，而实际认款额为5300万元，后又增加到5720万元，认款的海内外人士达1000多人。同年9月22日，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成立，刘靖基出任董事长和总经理。

刘靖基秉承“爱国建设”理念，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上海经济发展和安排回城知青起了积极的作用。爱建公司创立初期的业务分为四大块：房地产业、金融信托、实业投资和对外投资，开创了上海最早的高标准高层侨汇房，与纺织局合资创办了第一家沪港合资企业上海联合毛纺织有限公司，在闵行开发区创办了第一家独资企业环球玩具有限公司，促成了董浩云、刘浩清与上海锦江集团合资创办上海锦江航运公司。

刘靖基以坦诚的胸怀做党的诤友，为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建言献策。他提出的“加快上海对外开放，按照深圳特区的经验进一步开发上海”“下放引进外资的审批权”“改善上海的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和“创办上海航空公司”等建议，都得到政府采纳并实施。刘靖基还以上海市投资信托公司董事长身份2次赴国外募集资金，一次是1986年1月率团赴日本东京主持发行250亿日元公募债券，另一次是1988年6月赴英国伦敦主持发行150亿欧洲日元债券。

从刘靖基创办企业的三部曲可以看到老一辈实业家、企业家的爱国情怀和敬业精神，在他的身上体现着以“爱国、敬业、诚信、进取”为内核的企业家精神，是新时代民营企业家的典范和楷模。

(作者系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原调研员、研究员)

民盟先贤谷霁光：“光风霁月识沧桑”

□ 邹锦良



谷霁光

谷霁光(1907年—1993年)，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乌石镇景泉村，家境较为殷实。1929年，他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次年转到历史系就读；1933年，于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36年，从清华大学历史系调至天津南开大学任教；1938年，到厦门大学历史系任教；1945年，到国立中正大学任教；1958年，调到江西大学任教。历任江西省教育厅副厅长、江西大学副校长、校长、名誉校长，江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名誉主席等。1951年11月，谷霁光加入民盟，曾任民盟江西省委会主委，民盟中央委员、参议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

诲人不倦、甘为人梯的教育家

1933年，谷霁光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就投身教育事业，20世纪40年代在厦门大学担任教育管理工作。到江西任教后，长期担任系主任、教务长、副校长，教育厅副厅长、校长等职。他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积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如他曾经就怎样使学校上层问题发表过独到的看法，他说：“一个大学应当有一批名教授、名专业，培养出众多的名生”“高校要抓好教师队伍、教材建设、科学研究三件大事。”他常说：“教学是基础，科研是主导，教学促科研，科研提高教学，二者互为因果，而其中的关键又是教师”。身为学校领导，他既以此律己，也以此教人，几十年如一日，身体力行，未曾松懈。

谷霁光的学生数以千计，而登门求教或来函提问的，为数更多。他的态度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有问必答，经常一谈数小时，一信百言。一年的信件，不下数百封。对送来的文稿，他更是认真批阅，不厌其烦地三番五次提出意见，直到文章修改到满意为止。1979年，江西省水电工程局工人朱道清携自撰的80万字《中国史通志》书稿请教谷霁光，谷霁光不仅没有瞧不起这位非科班出身的研究者，还称朱道清是个奇才，

夸赞朱道清是一个从没有上过学堂，却又精通中国历史、哲学和古代水利史的饱学之士。

谷霁光对学生们的指导教诲，注重基本功，强调循序渐进，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和吸收最新科研成果，并要求有自己的创见，解决历史上的疑难问题。同时，注意因材施教，既帮助解决理论上与专业上的障碍，又指出前进与奋斗的目标，在治学方法上有一系列辩证施教的思想，使学生们受益匪浅。谷霁光上课极为认真，深受学生欢迎。他常说：“上课是非常严肃的工作，不可丝毫有碍，害人子弟。”学生们曾说：“谷教授常为我们批注修改文章，有时候万把字的文章，他老人家可以写出一二千字，的修改补充意见……”谷霁光甘当人梯，把一批批年轻人送上史学研究的前沿。

学生周奎书回忆说：“谷老是我的恩师，我1953年开始做谷老的助教。他对我们的要求真严，要求我们没有心得，万勿发议论。为此，我们写文章，大都要修改五六次。我有一篇文章，谷老竟要我反复修改了十四次……先生强调史德、史才、史识的辩证关系。他认为从事历史研究，德、才、识缺一不可。并告诫：要有广博厚实的综合学科基础，要甘于孤独、甘于寂寞、甘于坐冷板凳。切忌浮躁，不能急功近利，不能浅尝辄止。我们得益匪浅。”学生左行培回忆：“谷霁光先生常对我讲，上讲台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在讲台上，不可讲得不好，更不可有丝毫微错误，以免误人子弟。因此，我第一次上课的讲稿，他亲自审阅了六七次。就在上讲台的前一天晚上，他在办公室还陪着我，要我反复修改，熟悉讲稿，并一次一次试讲，直到深夜十二点钟。这些情景，今天还清晰记得。”

“学人不治学，虽活犹死”

谷霁光从事历史学研究长达60多年，且有很长一段时间兼任教育管理领导职务，他对时间抓得特别紧。他常对身边人讲：“智慧加勤奋，乘以时间，等于成就。”当然谷霁光关于珍惜时间最有名的名言是：“要在研究上作出成绩，在工作上取得成就，一定要在八小时以外奋斗终身。”他说：“用什么态度和方法从事工作，各个时代的原则和方式都不同。封建社会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资本主义社会是八小时工作制，八小时之内资本家剥削已经很残酷，八小时之外不给人自己支配，人都累死了还去剥削谁呢！社会主义完全是崭新的事业，人民当家作主，大家自觉工作的热情很高，人们常常在八小时之外，为工作努力不懈。我们搞科研，搞教育，一定要把八小时以外全部精力贡献出来，应研究八小时以外如何搞好工作的问题。俗语说：‘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要珍惜每寸光阴，否则，出不了成果。比如一个医生，面前站着许多病人，八小时之内忙完了，八小时以外不去考虑临床经验，他就只好一天两天病人，在科研上会无所成就。早年，我在清华大学做学生，当助教达七年之久，只看过梅兰芳、程砚秋两次戏，看电影也是半年只看两三次，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学习和研究。

后来到厦门大学当教授的七年也是如此，白天八小时不离研究室，晚上还坚持工作四小时。有人说：‘你的成绩不是凭聪明搞出来的，而是靠的勤奋。’这话不错，我聪明才智不如人，只好靠勤奋来补偿。目前，国内许多专家、学者之所以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都是在八小时以外奋斗不息搞出了成就的结果。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几十年如一日。这一条很重要，一定要坚持下去，才能作出更大贡献。”

1984年，他患病以后，大家都劝他应以休息为主。他却说：“学人不治学，虽活犹死。”依旧读书作文，没有间歇。他自嘲地说：“至于我，写文章是小农经济，经不住灾害，抢救抢救，一季到手就算数，只要一息尚存，决不荒废。”并补充道：“农人生之须臾，羨长江之无穷。”可见他对时间看得很重很重，抓得很紧很紧。

信念坚定、忠诚担当的民盟盟员

1951年11月，谷霁光光荣地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这是谷霁光人生又一重要转变。此后四十多年，谷霁光既用于教书育人，又专心于学术研究，同时还积极投身盟务工作，对江西民盟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959年7月6日至12日，民盟江西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的71名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谷霁光为主任委员。此后，谷霁光分别在1963年2月、1980年6月、1984年6月召开的民盟江西省第五次、第六次、七次代表大会上连续当选主任委员。谷霁光担任民盟江西省委会领导人前后累计时间长达25年，除“文革”期间，民盟各项组织活动出现停滞外，江西民盟的各项工作总体上在不断地发展进步。

1980年，《江西盟讯》复刊，谷霁光非常高兴，欣然为该刊物撰写了一篇复刊词——《江西盟讯》复刊。他在复刊词中毫不掩饰自己的欣喜，流露出一个盟员对自己组织的热爱和忠诚。他在文章中说：“历史条件形成了盟作为党领导下的一个民主党派组织，也逐渐规定了他的性质与任务，这都不是以人们的主观想象或主观愿望所能办到的，而是客观历史条件的必然发展。理论与实践已经表明：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得一眼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当前我国正进入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史时期，祖国在召唤，党在号召，民盟又怎能中途退出，早日仟肩！”“即使是在十年动乱时期，盟员无论在城市或在乡村，学习和工作，也仍然是一步一个脚印的，盟员一心向党，一心向往社会主义，对盟也会时萦于怀，此情此景，记忆犹新。一旦党中央拨乱反正，盟组织的恢复、发展也很快，经历过崎岖坎坷，更加珍重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今日盟员，温故知新，豪情满怀，都想要竭尽绵薄，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此情此景，又何等动人心弦！”

谷霁光利用《江西盟讯》复刊的契机，教育全省盟员，要学习、研究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他指出，在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及其理论原则，要贯彻到各项工作中，都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动的艰巨过程，都有着实践、认识、再实践、

再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要把学习、研究和宣传融合在一起，对党的方针政策学得深、学得透，执行起来也就生气勃勃，卓有成效。

针对盟员学习认识上的差异，谷霁光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敏锐地指出：“这是正常现象，应该容许共鸣之中有争鸣，争鸣之中求共鸣。共鸣是政治上根本一致的表现，争鸣乃是认识上暂时差异的反映。”他提出，要提倡各自思考、各抒己见，同时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按党的原则精神办事，按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办事。由此可见，谷霁光念兹在兹的仍是党的领导，党的方针政策以及民盟的作为担当。正是基于此，他告诫盟员，要加强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他在文章中说：“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经验，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很宝贵，个人的体会也很深，今天讲‘四化’，为‘四化’服务，得更加重视这条经验，在新的形势下，还应该提出新的要求。”“在我们老一辈当中，应该说更应引起重视和警惕，决不可以放松自我教育、自我改造。”

以知识和学养服务国家、奉献社会，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和担当，也是谷霁光一以贯之的情怀和风格。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兴起，古村古镇这种承载着历史内涵的载体前景堪忧。1991年，85岁高龄的谷霁光对学生、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周奎书谈了江西省乐安县流坑村的保护问题。谷霁光说：“多年的战乱，将许多有价值的村子毁坏了，这个村子能保存下来很不容易，文物古迹那么多，是一个活的历史博物馆，值得我们珍视。同时，流坑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中国封建社会那么长，这种一村一姓延续千年不变的村落，就是它坚固的根基。我们应该解剖它的封建土地制度、小农制度、宗法制度、科举制度、宋明理学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流坑村是一个典型。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首先解剖商品，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细胞，从细胞入手，最终才把问题搞清楚。我们研究封建主义，必须从解剖村子开始，村子是它的细胞，过去我们忽视了这一点，现在应该补救。今天，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如何将流坑这类村子搞上去，同样是需要花大力气认真研究的课题。”在谷霁光的鼓励下，周奎书深入流坑，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写出了《千古一村——流坑历史和文化的考察》，为流坑的古村落文化保护及推广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谷霁光人文高等研究院)

